

在湖北沙市，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全国机械行业普遍任务不足的情况下，沙市市属一机系统的企业，1980年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他们生产的出口产品、生活用品和为轻工服务的产品销路很好，18家工厂没有一家亏损，利润比上年增长38%。可是，在调整中能优先拿到投资、贷款、设备的市属一轻系统，1980年总产值比上一年只增长9.6%，生产上的困难户还比较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有几条，最重要的是对经济联合的态度不同。一机系统困难大，压力大，决心从联合上找出路，积极协助调整组织联合，结果带活了一批“吃不饱”的企业，变被动为主动。一轻系统日子好过一些，对联合抓得松一些，相比之下，发展的步子就显得慢了一些。市轻工局已悟出这个道理，开始急起直追了。

联合可以发展优者，“改编”劣者，既能使困难的企业少关停多并转，稳定安定团结的大局，又能把国内外需要的产品搞上去。

沙市作为湖北省工业改组的试点地区，从1979年初就开始走联合之路。现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建立的公司、总厂有12个，市属厂与社区、街道、学校合资联营的企业有10个，两个厂厂联合的有14对。这些联合体都是按照调整的方针，取长补短短处，各自围绕一个有生命力的产品组织的。他们诞生的过程和



沙市仪器仪表公司通过联合成立以后，民用电度表产量成倍增长，质量跃入全国先行列。这是工人们在检验产品质量。

绍 甲摄

联合之路是生财之路

——沙市工业部门结合调整发展经济联合的调查

在全国机械行业任务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沙市市属一机系统的企业，去年的总产值比前年增长25%。可是，在调整中得到各方面优待的市一轻系统，去年的工业总产值只比前年增长9.6%。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呢？这篇调查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明了联合之路是生财之路、发展之路。

发挥的作用显示出：搞好调整要抓联合，联合搞得好的可以促进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沙市毛巾总厂的经历，就有典型意义。这个总厂是由原毛巾厂、毛巾二厂和手帕厂组织起来的。毛巾厂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老厂，技术力量比较雄厚，产品适销对路。他们生产的螺旋毛巾，比普通毛巾多两个毛圈，柔软厚实，吸水性能强，深受国内外用户的喜爱。去年仅香港、新加坡的客商，就五次登门订货。1979年，外商要求提供螺旋浴巾四十多万条，他们只能生产21万条，厂领导经常为“吃不饱”发愁。原街道办的毛巾二厂，设备、技术条件差，产品质次价高，1979年一年就亏损八万元。手帕厂品种不对路，产品严重积压。这两个厂已从商业部门拿到订货合同，从上到下都为“吃不饱”大伤脑筋。去年，市里组织这三个厂联合起来。原手帕厂的34台织机，稍加改造，转产外销产品，使螺旋浴巾的年产量由21万条猛增到41万条。毛巾二厂更新了设备，调整了工艺，生产起细毛毛巾等热门货。

联合救了困难户，两个奄奄一息的企业“起死回生”了，整个联合体的收入也增加了。去年毛巾总厂的利润，比上一年三个厂时增加54%，达到100万元以上，成了这个小手为数不多的“百万富翁”。利润增加，工人生活福利也改善了。毛巾二厂、手帕厂的工人，过去拿不到奖金，去年每人平均得奖金115元。总厂用公益金修建了一栋2,10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目前正在准备修第二栋。职工们从联合中得到了利益，高兴地说：联合之路是生存之路、发财之路、发展之路！

就靠联合的办法，让困难的厂子尽可能合并、转产，少关少停，全市先后搞活了29个企业。在前两年调整中，沙市只关掉了一个小卷烟厂。

联合所以能带活困难户，是因为他们同生产“拳头”产品的企业结伴协作，共同发展了社会急需产品的生产。沙市是个轻纺工业为主的城市，拥有一批适销路的产品，轻重工业都有一些名牌和出口产品。近两年来，主要依靠联合的力量，这些产品都有了发

展。联合前后对比，获得国家金质奖的鸳鸯铝床，由年产327台增加到746台；获得银质奖的鸳鸯牌床，由年产136万条增加到165万条。其他适销产品，如收音机由年产11万台发展到36万台，民用电度表由500只发展到20万只，低压阀门由1,240吨提高到1,770吨……

事实说明，联合能形成新的生产力。那么，形成新生产力的源泉是什么？是现有企业的巨大潜力。通过联合，可以发掘和利用这种潜力，这正是联合的奥秘所在。

鸳鸯铝床的发展过程，是个很好的例证。这种产品早在1974年便凭着它优异的质量挤入欧美市场，受到外商的欢迎。沙市机床一厂费了很大的劲，1978年只生产327台。为了满足出口的需要，这年年底，他们制定了一个达到年产一千台生产能力的扩建方案，开列了一张“五要”清单：一要国家投资250到300万元，二要新购设备103台，三要招工724人，四要扩建厂房六千平方米，五要七年时间。这个计划，也是精打细算搞出来的，并非漫天要价之作。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传达下来了。上级没有批准他们这个方案，市里给他们当“红娘”，把两家公司械厂和一家铸造厂跟他们撮合在一起，组织了机床公司，利用这三家“吃不饱”工厂的厂房、设备、人员为铝床协作配套。结果只用了79万元的贷款和技术措施费，添了38台设备，新建了1,080平方米的厂房，招收了26个新工人，就于去年底提前五年形成了年产一千台的生产能力。对照那个“五要”清单，在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是多大的节约啊！

沙市在联合中不仅挖掘国营企业、大集体企业的潜力，而且注意把社办企业、街道办企业、校办企业闲置的人、财、物利用起来。仅是仪器仪表等五家公司、总厂，通过联合就利用起这类企业的厂房达6,900平方米，资金有45万元，劳动力达450人。利用社会

潜力来发展生产，为国家节省了开支，避免了重复建设，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这都有利于调整方针的贯彻落实。

通过联合还可以调整工业布局 and 产业结构，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改组工业，为把国民经济纳入正常发展轨道打好基础。

沙市解放前几乎没有工业，建国以来发展工业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条块分割等原因，不少企业产品重复，工艺重复，设备重复，在经济上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这个总共只有264个工厂的小市，就有25个铸造厂和铸车间，35个热处理车间，13个电镀车间，消耗能源多，污染浪费大。实行联合以后，就能冲破“小而全”的不合理状况，按生产需要、经济合理的要求进行调整、改组。沙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在这方面就有明显效果。组成这个公司的五个工厂中，原来生产收音机的有两家，生产石油仪表的有三家，生产变压器的有三家，有注塑机的四家，自己搞电镀的四家。联合后，进行了合理分工，将原来五个“小而全”的厂改为收音机、石油仪表两个总装厂和变压器、扬声器、线路板、注塑、表面处理、模具等六个零部件和工艺专厂。这样一调整，生产立见成效。如塑料机壳，原来无线电厂和无线电二厂都在生产，效率比较低；成立注塑厂后，把人员、设备集中起来使用，生产效率比联合前提高1.6倍。四个厂的电镀车间（班）合成一个表面处理厂，提高了质量，减少了污染。按专业化组织生产，为整个公司的生产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组建公司前，收音机年产量由六万多台发展到11万台，整整用了五年时间，1979年联合后的第一年，收音机产量提高20万台，去年又比1979年增长了80%。石油仪表的年产量由联合前的17台增加到100台以上。公司的利润1979年比上年增长1.3倍，去年又比1979年增长17%。

经济联合日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联合之路。最近，沙市又在组建两家总厂和六个其他形式的联合体。联合的范围也跨出本市，已同恩施等原产料产地办起四个合营企业，同武汉、上海等五个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签订了技术联合协议。这些联合，将促使沙市的工业在调整中继续前进。

本报记者 郭龙春 李桂生
本报通讯员 邱声鸣

出口产品要以优质取胜

我国的出口贸易额，近来已有所增长，要做到继续增长，必须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通过提高质量来提高售价和创汇率。

同样品种同样规格的出口商品，是高档货还是低档货，售价往往相差一两倍，甚至更多。1979年我国出口的陶瓷，论件数占世界第一位，论收汇却占世界第五位。目前迫切需要把出口商品的生产转移到质量第一的轨道上来。扩大出口，当然意味着要增加数量，如果简单地扩大出口理解为多出东西，那是片面的。由于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少数出口商品的数量不能增加，还可能有所缩减，而提高质量和创汇率，就可以在耗用同样多的原材料、能源、动力、人力和费用的条件下，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使出口金额不致减少，甚至可能增加，并能促进国内生产技术的提高。从长远来看，坚持以优质取胜，还可以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和竞争能力，消除国际上对某些商品的进口限额对我扩大出口的影响。因为限额一般是限量不限价的。

以优质取胜，既是指的商品内在质量，也包括商品的外观质量。在现代国际市场上，无论是商品的包装、花色品种、款式，还是商品的组装、质地及产品质量等，都会影响商品的售价。有些商品改

进包装后，适应了国际市场的要求，价格一下就能提高好多。交货是否及时，也大有关系。据香港服装业界反映，只要我们的出口服装及时交货，价格就可以提高15%。可见，优质的含义很广，各方面的潜力很大，是大有可为的。

有些同志认为，以优质取胜，既有技术问题，又有管理问题，还有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似乎很难解决。但这绝不是无能为力为的。近年来，我们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机电产品，质量迅速提高，打开了国际市场的销路，卖得较好的价钱，就是证明。只要思想上重视，下决心去扎扎实实地改进工作，问题并不难解决。

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不仅仅是工业生产部门的事，外贸部门也有大量工作可做。它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推销、调研，向生产部门提出改进质量的意见，为生产部门提示产品设计和生产方向，介绍或提供国际市场上流行的样品等等。我们不应坐等生产部门提高商品质量，需要的是工贸双方密切联系，团结协作。

有关部门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出合理的政策措施，要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严格执行进出口商品的质量标准，不合格的不准出口；对优质产品，要实行优价收购的政策；还要加强对产品设计以及包装装潢等设计人员的培养，鼓励他们勇于创新。

按市场需要和用户意见改进生产

芜湖市微型电机厂产品受欢迎

安徽芜湖市微型电机厂生产的各种微型电机，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国内用户和外商都认为，芜湖微型电机耗电小、温升低、震动小、耗电少、效率高。近几年，尽管产量一再上升，但仍供不应求。

芜湖市微型电机厂原来是五个五金制品厂，1966年改产分马力电机。当时，

全国这样的厂有几百家，而且规模比它大，设备比它强，这个厂只得靠“剩饭”过日子，生产经常处于半停顿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立志创新。通过调查，摸清了社会需要，选定离合器电机和为洗衣机、电冰箱配套的电机，作为自己的产品发展方向，终于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河北银鼠皮裤畅销国外

河北省故城县皮毛厂鞣制加工、裁配成的银鼠皮裤，毛色一致，配制合理，缝线均匀，无灰无灰，皮板轻巧，最适合做高档裘皮服装里子，受到外商欢迎。除故城外，东鹿县皮毛厂和大营皮毛厂也已收购几十万张银鼠皮。围场县收购了一部分地老鼠和山老鼠皮。这两种鼠皮绒厚、毛细、光泽好，保温性能强，制成的女短衣和女大衣将参加今春广交会。

季根明

以「新」争客户 以「优」夺市场

全平县 宁海丝织厂 畅销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山东省平山县是“宁海丝织”的故乡。该县丝织厂针对国际市场的需要，大力发展新品种，不断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已使产品畅销日本、瑞士、英国、香港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过去，平山县丝织厂为发展新产品重视不够，品种老一套，销路不畅，1976年因品种不对路，积压出口丝织一万多匹。

1978年以来，这个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同外贸部门密切合作，互通情报，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的变化情况，根据国际市场需要，大力发展适销对路产品。他们总结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快的特点，走上前看一步，后看一步，在产品品种畅销的时候，就着手试制新产品。一旦原来的产品滞销，新产品可以立即打入国际市场。他们试制的桑棉绸，一试织成就受到了香港客户的欢迎，生产多，客户全部包销。

提高质量，是增强出口丝织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关键环节。全平县丝织厂对产品质量实行了一条责任检查制，干部、工人增强了责任心，产品质量明显提高，产品出口合格率达到了99.3%。

王熙玮

为“扬名隐迹”

文志岳

武汉卷烟厂生产的“游泳”牌香烟和襄樊卷烟厂生产的“白鹤”牌香烟，向问世以来，因质优价廉而受群众欢迎。在湖北境内许多地方，是经常可以买到的。

然而，自从这两种香烟在全国被评为优质产品之后，市场上就不容易买到了。当然也不是完全买不到，至少有两个办法可以买到：一是从“后门”买，二是在闹市用“议价”买。

这个厂职工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一度把注意力集中到讨论奖金问题上。厂党委及时组织职工代表大会，把大家了解国家当前的形势和党中央的要求。许多代表学习后表示，职工个人生活的改善，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他们提出，要努力挖掘企业潜力，多生产一些手表，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

长期以来，天津手表厂许多工种的工时定额是凭经验估算的，有的偏低，不能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职工代表们建议根据实际测定的结果，重新修订工时定额。原来生产一千个手表规定要用350个工时，现在，表套车间的代表提出减少到329个。仅此一项，一年就可多生产表套146,000个。

为了确保今年生产任务的完成，职工代表们和厂领导干部共同商议决定各车间都成立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攻关小组，争取今年全厂完成41项重大技术革新。正在筹备设计的外观组，专门负责表盘、表套的设计，以解决天津手表花色少的“老大难”问题。（据新华社稿）

大城市菜田面积必须稳定



近年来，有些大城市蔬菜供应情况普遍不好，菜少、质差、价高，淡季缺菜时间也都大长。

城市缺菜的主要原因，是乱占菜田的情况相当严重，蔬菜生产得不到保证。以北京为例，从1977年以来，郊区菜地被占用三万亩。上海市近两年菜田面积越来越少，被征用和租佃的菜地，共占用菜田一万多亩。武汉市有三万多亩菜田被占，占菜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还有些城市菜田面积是空有其数，不少

价”买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就写了一副对联：“长江水深‘游泳’，岂能地难见‘白’”。

群众需要的是优质产品，而不是一个“好名声”。如果某种产品一经评为“优质”，就在市场上绝迹，只有少数人能得到，那么，这样的优质产品对群众利益之有？

但愿扬名物更重，切莫徒具虚名货无源。



电波万里骨肉情

——记南京市电信局话务员为台湾同胞找亲人的事迹

去年的一天中午，江苏省南京市电信局话务员程碧桃和往常一样，正在聚精会神地值班。大约12点钟左右，突然接到从海外挂发的长途电话。发话人是一位台湾同胞，他迫切希望能在南京市内尽快找到他的叔父。发话人声称他的叔父住址不详，请求话务员帮忙帮助查找。

南京市区人口已达一百七十多万，怎么查找？程碧桃，这位仅二十来岁的女同志，一听说为台湾同胞寻找亲人，赶快拿起话单，立即紧张地工作起来。她以娴熟而又敏捷的动作，向有关单位和派出所一一查询，但毫无结果。按照业务规定，象这类“地址不详”的无头电话，早就可以不予受理了。但是，程碧桃并没有这样做。她想：台湾与祖国大陆已经隔绝了三十多年，至今尚未直接通邮通电。关山重重，鸿雁断绝；隔海相望，骨肉分离。如今这位台湾同胞不远万里，好不容易从海外挂发长途电话，要求寻找失散多年的骨肉亲人，自己怎能忍心将这个电话轻易“退”回去呢？于是，她又主动发话人进行联系。根据发话人新提供的一点线索，小程当即中断，迅速打电话给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请求他们予以帮忙。后来，在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力协助下，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关部门，查明发话人现在四川省乐山县某制药厂工作。小程获悉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即将电话转接到那里，在其他话务员的密切配合下，终于使这位台湾同胞及时地与在这位大陆上的亲人直接通话了。

较有力。

在稳定现有菜田的基础上，还要加强菜田的基本建设，解决灌溉排涝设施，使现有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成为高产稳产菜田。现在不少菜田单产很低，平均亩产四五千斤，如果现有菜田平均单产达到一万斤，就可以大大改善对城市中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要保证有足够的蔬菜种植面积，关键在于大城市和工矿区党政领导机关认真抓这项工作。首先要采取行政干预的办法，明文规定不准占用大城市郊区分区现有的菜田。还要通过清理核实，把占用的菜田补足，并且长期稳定下来。最近南京市设想把现有菜田面积作为城市绿化面积，不准乱占乱建，市政府要求全省81万亩菜田稳定，菜与粮、蔬菜与工业农业生产发生矛盾时，要给蔬菜让路。这些由省、市政府制订的措施，都比

本报记者 邱原

在硬骨头六连生活的日日夜夜，义务兵们的崇高品德经常使我心潮滚滚：
他们有美好的理想，并把实现这种理想的心血倾注在日常的工作中；
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又把这种感情灌输在爱祖国、爱人民、爱战友的行动上。

斗志昂扬

一天上午，六连向六大军区检查团的军事汇报开始了，一名肩扛火箭筒的战士跑步进入射击位置，对准秒速六米的电动坦克靶，“叭！”火箭弹在靶中心开了花。看台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这名战士叫陈道荣，1973年入伍，1977年当火箭筒班班长。三中全会公报刚发表，四化建设出现了热潮。他曾经：“军事技术再好，到地方上也用不了，何必那样钻研？”自卫还击作战的枪炮声把他震醒了：“南面有狼，北面有熊，都在向我国举刀舞爪。现在拿着枪杆，可军事技术不过硬，一旦上了战场，怎么打胜仗？就是将来拿起了镢头锄头，一旦狼熊窜进来，也得要重新拿起枪杆，消灭敌人！”从此，他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苦练打运动坦克的本领。为了适应战场剧烈运动后打坦克，他顶着烈日跑步后再练瞄准；为了彻底摧毁坦克，他在昏暗的灯光下精心计算，找出最佳击发点，火箭弹直中靶心。他说：“一定要打它个中心开花！”四年来，他参加实弹考核、比赛、表演23次，21次命中目标；他带领的班打了五次满堂红，建立了集体三等功，成为全连“打坦克能手标兵”。

象陈道荣这样想、这样练的又何止一个？特等射手标兵陈川山、战术能手标兵孟启荣、优秀教员标兵李林……都是这样想、这样练啊！他们象一面火红的战旗，引导全连同志天天在餐风饮露，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鱼水情深

六连会议室里，悬挂着几面鲜艳的锦旗。面面积记录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动人事迹；在海滨野

沸腾的军营——记硬骨头六连的义务兵们

营，见群众饮水不足，就加班加点打出水井；在手动弹爆炸时刻，排长于明群用身体掩护民兵的安全；在校外辅导中，班长杨建青给几百里外的无锡六中少大队去信三十多封，培育青少年英雄……
其中最新的一面是驻地附近西木坞大队送的，上写：“鱼水情深”！

第三天，太阳从云缝中钻了出来。演习归来的战士正准备洗漱，突然发现副班长陈宝林一身泥巴，一脸汗珠，正在把稻谷一盆一盆从饭堂端出来，晒在门前刚刚干燥的水泥地上。“是啊！能抓紧时间晒晒多好！”全连战士立即行动起来，拿起扫帚、脸盆、抽屜、灰斗、木板，把晒在屋里的稻谷全部搬了来。值勤的战士杜元春找来木耙，将稻谷翻了一遍又一遍。

稻谷晒干了。战士们见社员正忙着抢种，他们又找来小车、扁担、竹杠，推的推、挑的挑、抬的抬，向西木坞送去。社员们望着晒好的五千多斤稻谷，感动地说：“你们把心都掏给了我们啊！”
第二天，正是忙收早稻的季节，雷雨总是下个不停。社员收割的稻谷，由于没有地方晾晒，眼看就要长霉发芽了。救粮如救火！副指导员和连长一商量，立即腾出房子给社员晾晒稻谷。连队食堂晾不下，一排战士又把宿舍腾出来。

心心相连

一天，指导员齐有为刚吃完药，正准备午休，老战士张跃新突然闯进连部，红着脸说：“我爸，她妈，带着那个，都来了！”指导员知道，“那个”就是他的未婚妻，马上应道：“好！你先招呼一下，我就来。”

一个月前，爱说爱笑的张跃新突然不再不响了。原来，他收到未婚妻的一封信“告吹”信，说他大腿已

断，成了残废；连连去信解释，也不见回音。其实，小张的腿根本没有断，是跳木马碰伤了膝盖，经过住院治疗，早已痊愈康复。只是由于探亲的乡邻把风说成雨，夸大了伤情，未婚妻听信误传，来信要断“关系”了。

该怎么解除误解和疑虑呢？齐指导员想来想去，决定向小张的父亲、未婚妻和她的母亲发出邀请。现在，他们果然应邀来队了。

齐指导员向屋里走着，想着：“关键是要让他们看清小张的腿。”一进门，他见桌上茶水 and 杯子都没有，立即喊道：“跃新，到队部把热水瓶、茶杯都拿来，要快，跑步！”

张跃新应声跃起，几步就跑出了大门。队列训练的時刻到了。齐指导员特意陪着三位客人来到演兵场上。他指着队列中正步走的张跃新，对客人说：“看，他走得多么带劲！”跑步开始了，又说：“看，跃新的弹跳力多好啊！”

晚上，齐指导员再次来到客人住地，不仅仔细地向他们介绍了小张负伤和治疗的经过，还介绍了小张四次受奖的成绩。姑娘听着听着，深情地望了小张一眼，低头笑了。

分别那天，姑娘亲切地对小张说：“跃新，别记挂了我，等着你们！”他爸、她妈也再三叮咛：“孩子，好好干，别辜负了首长的信任！”

类似这种官兵爱兵、兵爱兵、兵爱兵的动人事迹，在六连可多呢！战士马华林的母亲病了，排长黎明悄悄寄去二十元；战士们在山区因雨缺粮，连长黄柏菊一扁担扁挑挑来了大米；有的干部衣服没来得及洗，战士童兵主动悄悄洗净，晒干，叠好；……就这样，官兵心心相连，把连队结成团结战斗的集体。

壮怀激烈

学习了改革提升干部制度的精神，全连的议论平静了，可代理排长吕振团却陷入了新的苦恼。这是为什么呢？

吕振团原是军政文三优的班长，不久前连队宣布他“代理排长”。他本是准备提干的苗子，还有个相爱了几年的姑娘。可是，一听了改革的精神，这棵苗子“黄”了。原来那个对象听说他提不了干部，也和他“吹”了。有的战友劝他说：“你拿战士的钱，管干部的事，何苦呢？还是好好休息，等着复员算了。”

难道只有提干才是“前途”，复员就没有前途吗？忙了一天的吕振团，晚上躺躺在床上，脑海里又翻腾起来。他想了许多。想到革命先烈，想到家庭的翻身和自己的成长，也想到许多复员的战友。连队班长徐忠东回到农村，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很快改变了队里的落后面貌……。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了。他对自己说：党的事业就是前途，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幸福！我虽然不提干了，也要在连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现在是撒手不干，那灵魂该多肮脏！

吕振团从折磨中挣脱出来，工作干得更欢了。搞火箭筒训练，他带头认真听课，刻苦练习操作，成绩优秀。突击插秧，他的手脚被泡烂了，仍提前上工，推迟下工，插足标准，农活质量第一。外出完成任务，他模范执行军政纪律。全排得了三面红旗，他受到团的通报表扬。

有人问他是怎样摆脱折磨的？他在回信上写道：“个人的一‘黄’一‘吹’算得了什么？”“只要有利于部队现代化建设的事，我双手拥护。”“我要向前看，她要向‘钱’看，强扭的瓜有什么甜呢？”

“我牢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牢记自己是人民的义务兵。我一定把青春献给亲爱的连队，献给伟大的党！”
光荣属于前进中的人民义务兵！

廖光声

“当领导，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影响”

——记北京市机械局副局长杨广枝

现任北京市机械局副局长兼北京锅炉厂党委书记、厂长杨广枝，是个青年干部。他走上领导岗位后，对自己要求严格，不徇私情，因而腰杆硬，说话灵，群众信服。他常说：“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享受。当领导，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影响，要带好个头。”

杨广枝当上北京市机械局副局长后，一些来找他办私事的人都带有各种“见面礼”。对此，杨广枝执意谢绝，从不接受。一次，有位同志见杨广枝的爱人即将临产，送来两只鸡，杨广枝回家看望后，午饭也没顾得上吃，抓起两只鸡就退回去了。

1979年12月，杨广枝受机械局党组的委派，兼任北京锅炉厂党委书记和厂长。他上任后，立即在全厂中层以上干部中宣布自订的“约法三章”：（一）不搞搞门邪道，不搞特殊化；（二）办事认真，不推诿，不扯皮，（三）赏罚严明，一视同仁。他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要自觉排队，从不利用自己的职务去谋求方便。去年8月的一天，杨广枝正在厂里开会，接连三次接到昌平县口镇他岳母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的大孩子昏迷不醒，病得很重，要他快些赶去。因路

程远，厂里其他领导同志坚持要给他派一辆小车，但杨广枝横竖不坐，乘公共汽车赶到南口镇把孩子送进医院治疗。当时，他的第二个小孩也正患重病，夫妻两人工资不高，生活困难。机械局领导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临时给他补助100元钱，经劝说他，他爱人勉强收下了。但杨广枝得知后，严肃批评了爱人，立即把钱全部退还局里。

杨广枝不徇私情，对有关群众利益的事却办得很认真。这个厂的三千五百多名职工中有三分之一是青年人，他们盼望能有一个业余活动场所。杨广枝来后，支持青年把厂里被称为“西大荒”的一片空地建成了足球场。厂里在翠微路附近有两栋宿舍楼，多年因锅炉负荷小，冬天送不上暖气，室内冷冰冰。去年，经杨广枝提议，厂党委作出决定，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抢在入冬之前解决了锅炉问题。

由于杨广枝严格要求自己，热心为群众办事，在纠正不正之风中身体力行，使全厂职工心情舒畅，干劲冲天。去年，这个厂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生产计划，产值比前年增长10%。最近，杨广枝被选为石景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共北京市第五届党代会代表。

本报记者 徐光耀

他慢慢清醒了，承认过去闹事的做法是错了。这之后，有人几次给他来信，要他再出去贴大字报。他刚走到路上，想起厂里党组织的热心关心和教育，又退了回来。

滕沪生的劳动态度也有了转变。他身上的半导体收音机不见了，上班时精力集中，接连几次及时发现别人把做砂布的砂型搞错了，避免了质量事故。有一次，他自己刚把砂布的砂型搞错了，马上就纠正过来，还主动跑到车间办公室检讨，请求领导按厂的规章制度对他罚款。

滕沪生宿舍的旁边，是这个厂的技工学校。滕沪生下了班，经常跑到技校打乒乓球，看学生们上课。这件小事引起了厂党委组织的注意。

一天，滕沪生又来到技校打乒乓球。厂技校负责人徐荣根老师热情地招呼他，同他一起打球，鼓励他抓紧业余时间好好学习，并答应帮助他补习功课。徐荣根的一席话，说得滕沪生的心热了。第二天，他找到徐荣根，要求到厂技校参加上电视中学。

十年动乱，耽误和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滕沪生名义上虽然初中毕业，实际上在中学只读过一年书，文化程度很低。在一次全厂青工普遍考试中，语文和数学、物理他只得了三分。滕沪生有点灰心了。徐荣根老师跑来鼓励他，还给他买来一套青年数理化自学丛书，利用晚上时间帮助他补习，增强了他自学的信心。从去年秋天到冬天的三四个月里，滕沪生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学习上。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到考试时，三门功课都在八十分以上，终于跟上了电视中学班的课程。

本报记者 郭礼华 谭军

共产党员谈端正党风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这种“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有县委的各位负责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上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陪

的作法亟应改革，除去讲话的同志作陪，台上挤得很满，人们觉得热恋之热。显然，问题不在台上人多少，而是不要把台上与台下看成是标志什么或区分什么的界限，遇事只要从实际出发，把该办的事办好就是了。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这种“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有县委的各位负责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上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陪

的作法亟应改革，除去讲话的同志作陪，台上挤得很满，人们觉得热恋之热。显然，问题不在台上人多少，而是不要把台上与台下看成是标志什么或区分什么的界限，遇事只要从实际出发，把该办的事办好就是了。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这种“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有县委的各位负责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上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陪

的作法亟应改革，除去讲话的同志作陪，台上挤得很满，人们觉得热恋之热。显然，问题不在台上人多少，而是不要把台上与台下看成是标志什么或区分什么的界限，遇事只要从实际出发，把该办的事办好就是了。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这种“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有县委的各位负责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上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陪

的作法亟应改革，除去讲话的同志作陪，台上挤得很满，人们觉得热恋之热。显然，问题不在台上人多少，而是不要把台上与台下看成是标志什么或区分什么的界限，遇事只要从实际出发，把该办的事办好就是了。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这种“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有县委的各位负责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上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陪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这种“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有县委的各位负责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上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陪

的作法亟应改革，除去讲话的同志作陪，台上挤得很满，人们觉得热恋之热。显然，问题不在台上人多少，而是不要把台上与台下看成是标志什么或区分什么的界限，遇事只要从实际出发，把该办的事办好就是了。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这种“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有县委的各位负责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上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陪

的作法亟应改革，除去讲话的同志作陪，台上挤得很满，人们觉得热恋之热。显然，问题不在台上人多少，而是不要把台上与台下看成是标志什么或区分什么的界限，遇事只要从实际出发，把该办的事办好就是了。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这种“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有县委的各位负责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上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陪

的作法亟应改革，除去讲话的同志作陪，台上挤得很满，人们觉得热恋之热。显然，问题不在台上人多少，而是不要把台上与台下看成是标志什么或区分什么的界限，遇事只要从实际出发，把该办的事办好就是了。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这种“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有县委的各位负责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上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陪

的作法亟应改革，除去讲话的同志作陪，台上挤得很满，人们觉得热恋之热。显然，问题不在台上人多少，而是不要把台上与台下看成是标志什么或区分什么的界限，遇事只要从实际出发，把该办的事办好就是了。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这种“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有县委的各位负责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上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陪

的作法亟应改革，除去讲话的同志作陪，台上挤得很满，人们觉得热恋之热。显然，问题不在台上人多少，而是不要把台上与台下看成是标志什么或区分什么的界限，遇事只要从实际出发，把该办的事办好就是了。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委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普通的一员

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不满二十岁的志愿军飞行员韩德彩曾打败了美军“双料王牌喷气机英雄”——爱德华。如今，韩德彩已经成长为一名空军军长。韩德彩当了军长后，仍然不忘人民重托，不忘自己是普通的一员。

去年秋天，他下部队检查工作，归途中天下起雨来。他见路边社员冒雨抢救稻子，就叫司机把车停在路旁，悄悄地和社员一起参加抢救。等到稻谷收完，他的军装已被雨水浸透。

1981年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韩德彩机关干部一起到菜场劳动，扛起扫把打扫菜场，没有人看得出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英雄，一位军长。

这是他和菜场营业员聊家常。

孙振昌摄影报道



向他伸出温暖的手

——上海砂轮厂同志热情帮助失足青年改过记

“我要从零开始，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曾经在前年冬天上海少数人闹事风潮中名噪一时的滕沪生，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悔恨。

1979年初，刚刚从公安机关教育释放出来的滕沪生，要顶替退休的父亲到上海砂轮厂工作。

滕沪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要不要让他进厂？上海砂轮厂党委为此件事专门召开了党委会进行研究。

滕沪生长在一个经济比较困难的大家庭，养父母都有病，对孩子无法照料，形成了孤独、怪僻的性格。七十年代初，他初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奔赴黑龙江农场，并在农场入了团。不久，他所在的农场解散，转到农村插队。这样，一厢情愿生活欢快的心受到了打击，情绪渐渐沉下去。1978年底，他从黑龙江籍退回上海。他听说大街上有人演讲，就跑去看热闹。当演讲者借知青“上山下乡”问题进行煽动时，他想到自己的遭遇，肚里的气越来越大。他头脑发热了，以滕沪生名义贴出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还带头包围、冲击上海市革命委大楼。不久，公安机关把他乱乱乱乱乱乱拘留教育。

经过认真讨论，党委会作出决定：接受滕沪生进厂，依靠全厂党组织的力量帮助他、教育他，使他走上正道。

滕沪生来到上海砂轮厂，被安排在砂布





评“反对官僚阶级”

在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的革命洪流中，有些人趁机提出了一个所谓“反对官僚阶级”的口号。他们声称，现在的中国出了一个“官僚阶级”，或叫“官僚主义阶级”、“特权阶层”，而且这个“官僚阶级”、“官僚主义阶级”、“特权阶层”不在别处，就在领导我们国家的共产党里，就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把党的领导干部与官僚主义划等号，把领导干部与特权划等号。于是，在他们口里，共产党不再是光荣的象征，按他们的意思，批评和纠正产生官僚阶级的温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成了产生官僚阶级的温床。按他们的意思，批评和纠正产生官僚阶级的温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成了产生官僚阶级的温床。按他们的意思，批评和纠正产生官僚阶级的温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成了产生官僚阶级的温床。

说中国有个“官僚阶级”、“官僚主义阶级”或“特权阶层”，这个话我们是并不陌生的。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及其理论家们，不是也曾凭空摆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吗？他们以此作为“根据”，要把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批革命干部统统打倒，以便他们篡党夺权，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曾经给我们党和整个国家造成何等巨大的灾难呵！今天，公然提出“反对官僚阶级”的人，除了有的是划不清思想界限，情绪偏激之外，确有极少数人，是唯唯下不流。他们才牙所向，依然是要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国家的领导。

提出“反对官僚阶级”的人中，有人把我们党掌握着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对全国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而要克服它，就得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从根本上混淆无产阶级专政同剥削阶级政权的不同性质，以惑视听。

说中国有个“官僚阶级”、大叫要铲除“特权阶层”的人，特别抓住我们党内某些人有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作为自己的论据，迷惑一部分人。不错，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官僚主义、

特殊化作风，在党的某些干部中确有所滋长，极少数的还相当严重，直接损害了党的形象。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语重心长，完全正确的。人民群众以及我们党内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对党内某些干部中的这种不正之风提出批评，是完全有理由和正当的。但是另有极少数人，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据此作出在我国已经出现一个“官僚阶级”或“官僚主义阶级”、“特权阶层”的论断，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实很明显，我们党绝非大多数干部，更不是全部都官僚化了，都在搞什么不正之风。极少数的人的所作所为，绝不能代表我们全党。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几十年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取得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在当前这种困难成堆、问题成堆的情况下，胸无城府，勇挑重担，不分昼夜，为国操劳的，都是些什么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一切，把现实描绘得一片漆黑，“洪洞县里没好人”，不是政治上糊涂，就是只能是别有用心。

还应该指出，官僚主义、特殊化作风，一般属于意识形态、精神世界的问题，虽然不免带有深刻的阶级烙印，却不能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什么是阶级？还是列宁说得对：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生产社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这种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而这项任务在我国不是依靠别人，正是依靠我们党的领导胜利完成了。现在在我们有些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是应当坚决克服的，但是有什么理由断定他们都已经私人占有了生产资料，取得了在生产中的特殊地位，结成了什么“集团”，从而无偿地剥夺占有他人的劳动？怎么能说，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官僚阶级”、“特权阶层”，非得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打翻在地不可？我们一些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当然也有它产生滋长的社会、思想的根源，这就是：我们党长期处于执政的地位，一些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我国社会中残存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流毒，使等级观念、家长作风等得以蔓延；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弊端。但更应该看到的是，我们党对于上述这一切，一直是清醒的。我们党对这些不正之风，总是同群众站在一起，想方设法加以改革、整顿。即使当前的经济调整任务如此艰巨，问题如此复杂，困难又是这么大，可是还是花费

了很大的精力，包括采取许多措施，如颁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改变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在党报上公开进行批评，以至对错误严重者给予党纪处分，追究一些人的法律责任等等，以严肃党纪国法，整顿党的作风。这些，正是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性质的生动体现，正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标志。怎么能够允许把一个敢于为人民坚持好的，为人民改正错的，郑重的、负责任的党，同腐朽反动的旧政权的统治者相提并论，同“官僚阶级”划等号呢？

我们的国家在遭受长期巨大的破坏之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今日一切想为国家的中兴有所贡献的仁人志士、有为青年，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冲破一切旧的思想牢笼，勇于思考、探索新问题、新道理，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等在内的不正之风，无疑是十分可贵的精神，必须继续发扬。一定要切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和先进的中国从迂回曲折的道路中，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引导中国社会胜利前进的崭新的思想。一百多年来，早已被先驱者证明是走不通而抛弃了的东西，诸如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决不能原样拣回来，煞有介事地重新进行什么探索。

（原载2月9日《解放军报》作者 孔黔）

“社会效果”小议

据说“社会效果”这四个字已经长了一根棍子，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深恶痛绝，甚至感到有必要做一个决议来取消这个名字。

其实，对于“社会效果”这四个字，实在大可以不必忌讳。任何人搞创作，总想要有一定的效果。这本来就是他的目的。除了写给已看过的日记之外，写了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看就要产生一种效果，或是看得下去或是看不下去；看了之后，或是欢喜，或是悲伤，或是愤慨，或是惭愧。这都是作者写作时所企求的效果。这一点本身并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什么坏事。

拿着“社会效果”这几个字当棍子打人的事，我是相信有的，也是反对这样做的。我们反对打棍子，无非把这棍子是用的是什么名词，都反对；但是却没有必要把这句话问都废除掉。

所以实际的争论并不在社会效果的有无，而在别的地方。一种是认为对于社会效果可以不管不顾。他只管说他想说的话，在社会上起什么效果，那是社会的事，与他无关，他也并不想负责任。可是，这样的人，他的

生活却一天也离不开社会。他既然不打算对社会负责，又凭什么要求社会负责供给他吃、穿、住，供给他纸、笔和印刷、出版或者演出的条件，凭什么要求社会接受他这种不负责任的东西呢？一个社会要负责、要前进，当然就要拒绝那些会对这个社会有不利效果的东西。

于是来了第二个问题，究竟什么叫效果好，什么叫效果不好。这是需要争论的。因为确实有许多不同的标准。既然讲社会效果，就要看对社会利益的如何，也就是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至于什么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解决不了的。也可能还有个别的人，干脆就是以能够激发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满为效果好的。这就明显地违反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反了我们的宪法。

“这是用政治干涉文艺”。我们反对对文艺搞干涉，因为政治不可能解决艺术本身的规律问题。但是，文艺又离不开政治。事实上许多文艺作品都写了有关政治的内容，在社会上起着政治效果，它们用艺术的手段讨论着各种政治现象的对错，指出错误的性质，以及应当怎样解决等等。有人说，这是文艺干涉政治。我不赞成这样说。文艺要反映生活，就不能把政治从生活里剔出来，不让他反映。文艺家又不可能不都是一个政治的人，他的政治倾向、政治主张，总要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来，不反映是不可能的。但是，既然如此，对于文艺作品的政治内容，政治效果这一部分，总应该从它的政治上加以评论、判断，决定取舍吧。如果连这样的事也不许做，那就是只许你干涉我，不许我干涉你，未免有点霸道了。

“作品还没有出版，电影还没有发行，甚至还没有拍出来，怎么知道社会效果好不好？让实践检验嘛！”他们说：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因为在人的主观和客观实际之间，只有这样一道由及于及的桥梁，除此之外，并没有第二条通路。要知道某一种主张，某一个作品，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也只是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但是，这里说的实践，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并不是说每一个作品都要让所有的人看了，才能知道它的效果好坏。炒菜的时候，把盐放得太多了，一尝咸得不吃，你决不会把它端出来待客。虽然客人并没有尝到你的菜，但是你仍旧可以事先估计到如果端上去以后后产生的效果。

有些作品拿出来，产生了作者事先没有想到的效果，这样的事也常有。人的经验有限，不能因为某一篇文章的效果不好，就怀疑人家一定动机不纯。但是，知道会产生这种效果，因而事先多找一些可能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商量商量，不是更好吗？（原载2月9日《北京日报》作者 余心竹）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武新宇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阐明实施新婚姻法的三个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武新宇今天就实施新婚姻法的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如下：

一、新婚姻法关于婚龄的规定不会改变。

新婚姻法公布后，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普遍热烈拥护，认为这是好法律，正在用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要求登记结婚的青年增加得多了，有人担心可能会影响计划生育。

由于多年来各地实行的晚婚年龄比新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较高，一部分超过法定婚龄的青年没有结婚，现在结婚的男女青年增多一些是正常的。但我们仍需要大力提倡适当晚婚、晚育。目前结婚增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怕“政策多变”，怕新婚姻法关于婚龄的规定会变。这种顾虑是多余的。法律是有稳定性和延续性的，新婚姻法关于婚龄的规定，是经过反复多方面考虑确定的，其中也考虑到晚婚和计划生育的因素，决不朝令夕改，或者因为要求登记结婚的人增多就轻易改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继续抓紧搞好计划生育。结婚并不一定就要生育，我们要注意积极宣传计划生育工作，按照我国和国家的政策进行工作，当然也不能搞强迫命令。

二、关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结婚问题，要多做宣传说服工作，不宜简单从事。

新婚姻法实施后，有些青年反映，他们已和“姑表”、“姨表”兄妹恋爱，感情很深，不愿分开，是否一定要“拆散鸳鸯”，不准结婚。这个问题，在修订婚姻法时，曾经反复考虑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草案”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征求意见时，许多地方和部门以及一些专家提出，旁系血亲结婚生的孩子，产生某些先天性的缺陷的几率较高，现在实行计划生育，孩子少丁，更要注意人口质量，提倡优生。他们不赞成原婚姻法关于旁系血亲结婚从习惯的规定，建议明确规定禁止旁系血亲结婚。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生育一个有先天性缺陷的孩子（例如呆傻），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是一种负担，特别是对家庭负担更大。为此，新婚姻法规定“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这是必要的、适当的。但是在执行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传统的习惯和各地、各民族的不同情况。因此，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草案附说明中特别指出：“由于某些传统习惯的原因，特别在某些偏远山区，实行这一规定，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宜简单从事，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这就是说，对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间在新婚姻法实施以前

就有恋爱关系的，最好经过双方自愿，不要结婚，但对坚决要求结婚的，也不要硬性禁止，勉强他们分开。而在新婚姻法实施以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间没有恋爱关系的，就不要再恋爱、结婚了。在偏远山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一般地区有更大的灵活性。

三、婚姻以感情为基础，感情破裂是判决离婚的法律依据。

对于这个问题的，新婚姻法基本采用原婚姻法的规定，即男一方要求离婚，首先要经过调解；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但新婚姻法增加了“如感情确已破裂”这个条件，使法院有灵活处理的余地，能够适应某些复杂的情况，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有人说，感情确已破裂不好掌握，这是实践问题。要在办案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区别哪些情况属于感情确已破裂，哪些情况则不是。比方说，有的人本来与配偶感情不错，一旦提了干、进了城或上了大学，就要求离婚，这就很难说是“感情破裂”，而是一方所处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究竟是否“感情确已破裂”，还需要经过一段工作或一段时间才能判断。

有人说，不能只讲感情破裂，还要有“正

＜*＞

李先念同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会谈

（上接第一版）

他说：“中法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这些年来，中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法国社会党为促进中法人民的友谊、推动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先念指出：我们过去同法国社会党已有往来，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都面临着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社会进步的共同任务。他

当理由”，才能准予离婚。应当说，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感情破裂就是判决离婚的法律依据。为什么还提出要有“正当理由”呢？主要是因为有的人要求离婚是由于喜新厌旧或道德败坏等。这类离婚纠纷牵涉比较复杂，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如果要求离婚的一方对婚前的态度有问题或有错误，例如喜新厌旧、道德败坏，那是批评教育的问题。如果违反党纪、政纪或者国家法律，那是依照党纪国法给以纪律处分或法律处分的问题。对于离婚要求尚未，主要仍应看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如果感情尚未破裂，经过调解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还要继续维持没有感情的婚姻关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采取种种手段，百般虐待对方，这当然是错误的，应当进行批评教育，甚至给予必要的处分，但勉强维持这样的婚姻关系，对不愿离婚的一方难道不是很大的痛苦吗？至于要求离婚的一方道德败坏，那么和这种人的婚姻生活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离婚往往会给不愿离婚的一方造成物质上、精神上的种种损失，特别是对妇女，法庭在判处时，不仅应该判要求离婚的一方负担子女的抚养、教育费用，还可以考虑判处对无过错不愿离婚的一方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并且应该强制执行。

＜*＞

客广泛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

他说，双方在会谈中各自介绍了本国的情况和对外国际间的看法。他说，我们对李先念同志介绍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关注的东西以及在人民教育中所从事的教育很感兴趣。

他指出，今天的会谈和来到北京之后的见闻使他们了解到中国人民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和取得的实实在在的进步。他说：我们对中国人民当前所进行的新长征表示美好的祝愿。

密特朗说，我在会谈中从欧洲大陆和法国的角度出发谈到了对世界均衡问题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中国和法国都是世界均衡的因素。

随同代表团来访的28名记者以及法国驻京官员也应邀出席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和副部长李一氓、冯哲等。



李先念同由弗朗索瓦·密特朗率领的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举行会谈。

驻道孚县震中地区的部队指战员

临危坚守岗位舍己抢救群众

春节前夕受地震重创的七个公社群众全部住进了简易房

在这次强烈地震中，这些单位有些干部的亲属不幸遇难，但他们抑制住心头的悲痛，把群众的生命安危放在第一位，积极救护人民财产。某团政治处主任罗范章的独生儿子在地震中被压死，干事陈瑞国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遇难死亡，但罗范章和陈瑞国忍着个人的悲痛，积极组织参加抗震救灾，还耐心细致地做他们遇难者家属的思想工作。卫生队长谢明双从倒塌的房屋中爬出来，顾不得抢救遇险的家属和孩子，光着脚板组织救护伤员。正在值班的译电员冯炳雪在地震中头部负伤，被救出后没有回家抢救家属，而是迅速向上级发出了第一份详细报告震情的电报。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委和甘孜州委专门给部队送来了一批救灾物资，各部队都首先想到群众的困难，尽量让给群众。道孚县委分配给某兵站十吨帐篷，该兵站立即给了群众，自己加班加点搭盖简易房屋，接待过往人员。

在当地区队和成都部队领导机关派去的部队大力支援和抢救下，到春节前夕的2月3日，震区受灾较严重的七个公社的一万二千多名汉族群众，全部住进了新建的简易房。六十年前道孚县也曾发生过一次强烈地震，接踵而来的是瘟疫流行，饿殍遍野，人乘人掳劫；发生，受灾群众既不得换粮，又不受冻，社会安定，秩序良好。六十多岁的藏族老阿妈亚玛拉玛激动地说：“想想过去，比比现在，真是两个社会两个样。社会主义好，金珠玛米亲！”

这次迎春书画、篆刻展览是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的。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十日电 今天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幕的“迎春书画、篆刻展览”，吸引了书画家和书法爱好者，络绎不绝前来观赏。

舒同、赵朴初、郭沫若、张爱萍、楚图南、魏传、朱丹、陈鹤亮、启功、虞愚、徐之谦等在京的一百五十多位书法家、篆刻家、三百多件作品参加了展览。展览中楷、行、草、隶、篆等各种书体，风格多样，竞相争辉。今天前来参观的一些书法爱好者，兴致勃勃地当场挥纸展墨，为展览增添新的光彩。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十日电 由贸易部长崔嵬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贸易代表团，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外长部长李强、朝鲜驻中国大使金明泽等到机场迎接。

“迎春书法、篆刻展览”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十日电 日本政府对代表大来佐武郎一行今晚乘飞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十日电 日本政府对代表大来佐武郎一行今晚乘飞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十日电 由贸易部长崔嵬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贸易代表团，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外长部长李强、朝鲜驻中国大使金明泽等到机场迎接。

“迎春书法、篆刻展览”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十日电 由贸易部长崔嵬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贸易代表团，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外长部长李强、朝鲜驻中国大使金明泽等到机场迎接。

“迎春书法、篆刻展览”在京开幕

我国的文学创作在近四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掀开了我们文学史上新的一页。作家在反映新时代的新生活、新矛盾方面和反映历史生活方面做出了令人喜悦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广大群众向我们的文学提出一个要求：除了继续致力于反映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尽量使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作品中反映得更加深刻外，同时希望我们在文学创作上有个新的突破，有个大的发展。现在经过四年的实践，又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就是要努力提高艺术质量。我觉得这是当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文艺能不能继续发展，能不能取得新的繁荣，能不能把我们的创作真正推上一个新的高峰；能不能使我们的创作继续成为我们九亿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同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为他们所承认，为他们所欣赏。而面临着这种新情况，很多作家都在进行着勇敢的探索和辛勤实践，而且取得了成果。对这些成果怎么看待？有人把它拍得很高，也有人说它贬得很低。我觉得我们可以喜欢它，也可以不喜欢它，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们正在进行辛勤、勇敢的探索。对于这种探索、试验，以及人们所表现出的这种热情，这种信念，这种勇气和决心，只有采取热情支持、表示鼓励 and 促进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只有这样讲是考虑到当前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确实在实践中摸索着和探索着新的前进道路。

最近，我看了一些年轻同志写的诗。这些青年诗人对艺术形式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创新的尝试，渴望追求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探索的精神和态度是可喜的。但我以为，新的形式，应当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心理状况相符合，应该更加适应于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主张，例如企图找到这样一种形式，它可以不受现实主义、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束缚，它应当是立体的、交响的、复合的、多层的等等。认为用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传统的艺术形式，表达我们丰富的社会生活，表达和反映现实生活所出现的错综复杂的生活，表达现代人经过这样尖锐复杂的生活斗争之后所存在的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已经不能胜任了。不必否认在艺术的发展中，有某些形式会显得过时，但我对于某些青年作家，为解决这样的矛盾而寻找形式，目前还不敢苟同。

我认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和唯物主义的認識论是一致的。放弃现实主义，就无异于放弃了辩证唯物论。当然，一个作家可以采取浪漫主义手法，也可以采取现实主义手法，你甚至于可以采取某些带有象征主义的手法，象卡夫卡的作品所采用的那种把现实描写与象征手法结合起来的手法，写得好像同样有社会意义。对西方著名的作家、诗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无视甚至轻率地加以否定的态度，包括画家，什么印象派、达达派、立体派等等，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但是，一切生活，一切思想，一切天才作家的最优秀表现，一切艺术，总要找到一种最能立足于现实的形式来表述，而这种适当的形式形式是存在的，是可以找到的。当然，它不应该是简单的模仿生活。这种艺术形式必须适应它所表现的主题和题材。如果主题、典型、情节和环境的描写都以否认，如果内容因素是一位，内容是内容所决定的增加加以否认，实际上是不可能创造出真正新的美的艺术形式来。

现在有不少青年作者都倾向这样的观点，文艺创作不应当为任何现实主义的规范所束缚。把现实主义规范当作一种束缚来加以否定，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但是也无须恐慌，既然时代已经发展到现在，新的生活需要出现新的作家，新的作家需要寻找符合他的深刻感受的新形式，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至于寻找的形式是什么，可以允许不同的作家和诗人进行探索。把这种探索看成是大胆不迫，看成是洪水猛兽，看成是应予一顾，看成是明智的态度。应当支持这种探索，不能反对这种创作。不应该笔笔都浇冷水。象杜甫的探索，他所走过的这一段实践道路，有所成就，就承认他的探索是正确的道路；假如他探索了一阶段，证明是行不通的，那么我相信他会重新总结自己的经验，然后再找出一条更好的道路。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对待探索者，而不能采取简单的、大惊小怪、惊慌失措的态度，更不应采取抵制排斥的态度。艺术的检验，一是靠群众，二是靠时间。我相信，现在社会上，不管青年中、中年人、那种健康有力、爱国力量、坚持进步的力量、和广大劳动人民心相通，希望人民摆脱和改善那种不好的、贫困的生活境地的力量是占主导的。我们就是要决心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是个水平不太高的，或者不够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我自己通过反复

关于文学的创新问题

冯牧

提要：努力提高艺术质量，这是当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比如勇敢的探索和辛勤的实践，要采取热情支持、表示赞助和促进的态度，但是，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抛弃的，比如现实主义、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等。认为文学不应当为什么服务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艺术创新问题上，出现一些分歧是必然的，这种分歧要在共同的方向、目标引导下，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来求得解决。

实践，觉得还是这条道路正确，此外没有比这更好的道路。

现在，有一批相当有才华的年轻同志想要创新，想要突破目前的种种束缚，想要从传统的规范中挣脱出来，闯一条新路。这种热心于创新，积极铲除一切不合理的束缚、枷锁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抛弃的，比如文学必须坚持生活是第一性的，创作是第二性的，这点可能不能含糊。文学必须坚持从生活出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是叫做必须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因此我觉得是不能放弃的。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多年以来我们的作品为传统的规范性的文艺理论所左右，一谈创作就谈典型、谈人物、谈情节、谈典型环境、谈细节描写、谈故事，一想起这些就好像是一场噩梦，幸而这场噩梦已经过去了，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飞翔啊，任凭我的主观意志自由翱翔。说这种观点全部都是错的，也不一定，他这是故作惊人论。确实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文艺理论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后来“四人帮”把这种教条主义发展得极端，以至于把本来是正确的，艺术上的规律性的东西，也绝对地反对了，僵化了，规律变成了一条一条的框框。因此出现了许多公式化、概念化，简单服务于中心任务的作法。同志们有这样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此连文学前几十年总结之后，证明是合理的规律，都加以摒弃。这经过前几年的生活积累，有相应的艺术技能，而且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丰富的生活积累的思想作为指导。这个要求，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因为过去知识教条主义的错误，就认为本来是正确的也加以抛弃，不能坚持。在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出现过某些缺点、错误。今天就是要对这些缺点错误和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坚持和发扬正确的东西，克服那些错误的东西。正确的东西，特别是通过实践所创造和证实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不能看作教条主义。如文学必须通过典型反映生活，这是真理，不是教条主义。我曾跟一位青年作家讨论过典型问题。他问为什么要写典型？我说，好，你只说写不写典型人物和写什么？他说说为什么要写典型人物？我只说有独特性格的人物不行？对典型人物和个性化是矛盾的。这说明个别青年作者还缺乏起码的文艺常识和文艺理论知识。

有的同志居然提出这样的主张：一不写典型，二不写情节，三不写环境，只写某些心理，某种感觉，某些意境。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跟我谈的。我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特别是写诗，一首短诗，八行诗要写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怎么可能呢？我讲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是指那种比较大规模的、概括社会面比较广阔的环境。比如小说、电影、戏剧或者叙事诗，我们的是这个。如果你是一个抒情诗人，你是一个散文家，你不写典型人物是可以的。但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剧作家、一个电影作家，说我可以，一定要突破这种框框，突破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情节的束缚，我只写心理、感觉、意境，我看这种创作也可能有，但我相信这样的作品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

现在不是也有同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吗？他认为文学不应当为什么服务，我们的诗，只能作为诗服务，为艺术服务。这又是一个题目。这种理论，过去也有过，二十年代曾争论过。二十年代就争论过的理论，现在可能能争论呢？可以争论。我赞成不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为我们的口号。但是，任何文艺，不论是什么题材的作品，它都不可能同我们的时代脱节、我们的社会生活毫无关系。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文艺是没有生命的。有的同志提出：不能让所有的作家都去忙劳动人民服务。这可真像是惊人论。我觉得，假如有些作家把他们的任

务，仅仅局限或者规定在这么一个小范围内；我就是写这种东西，我生来就是要创造阳春白雪，而八亿农民看什么，我管不了，让那些写里下巴的人去为他们服务吧。这样一种情绪，是我所不能赞成的。同时，将提高的作品和普及的作品，为数知识分子创作的作品，和为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的作品对立起来，这也是不正确的。我赞成阳春白雪，也赞成下里巴人。我甚至觉得现在那种提高的作品，艺术性比较高的作品，太少了。但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能够心安理得地让自己的作品，永远停留在狭小的读者圈子之中么？为尽可能广大的读者而创作，难道不是一切作家无可推诿的神圣职责么？不能离开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所要反映的生活和矛盾，来修改谈创新。这该尊重作家、诗人在艺术上和形式上的追求，但是决不能赞成那种创新只是单纯地形式出发的论调。

我认为文学的创新，只有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随着时代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因而我们做为一个诗人的思想感情，能够站在这个时代的前进水平上，我们的这种创新才有牢固的基础和起点。我不赞成把创新看成只是形式上的变革。形式上的变革只是取得创新的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形式上的创新和革新，不等于作家的思想不断进步，不断提高。重要的是，作家的生活积累的不断充实和丰富，作家生活视野的不断扩展和加深。象是抓住这一环，是解决不了创新问题的，也是解决不了把我们的艺术质量大大提高一步这一历史使命的。

在艺术创新问题上，出现一些分歧是必然的。这种分歧只有通过我们的方向、目标引导下，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来求得解决。我们希望由艺术创新所造成的分歧上头去，不要导致思想的分歧，更不要导致政治上的分歧。我们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什么走到一起呢！

要求作家、艺术家为人民服务，为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服务，是天地正义的，就是对八亿农民不感兴趣，八亿农民就有理由不欢迎你。人民是强大的，任何要党和人民背道而驰的人，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惩罚。我不是说我们这些青年作家，当真要背弃人民，不是这个意思。我理解，有些人是想使作品之论，强调一个观点，强调容许一些人写一些比较难懂的作品或比较难懂的形式新最美的作品。

我觉得，任何诗人不管他选择什么形式，无非是为了解一个目的，要让自己的诗能够最准确地、最形象地、最有力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所以不好懂，可能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思想不成熟，自己提出同问题自己又回答不了，或者回答得很混乱。也可能是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自己有很好的构思，很好的感受，很好的诗情，但是如何把这种火花闪现在，这种诗情用一种最恰当的、最精确的、最美好的（他不能是丑恶的），最能确切地表达出来，在寻求这种最简洁、美好的形式的时候，诗人有时不能不糊涂。诗意很明却不为人所理解。对于这种现象，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如果有人下令命令，禁止写这种诗，我是最愿意的。也可能存在这样的诗人，他很有深刻的用意，也有一些非常简洁、简洁的语言，可能一下于不大为人普遍接受，但是过了一段以后，人们也就能够理解。象这种诗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的。诗人诗当然应该给它们存在的可能和一定的地位。但是，我觉得恐怕更多的情况是，诗人不能把自己捕捉到的非常深刻、非常精彩的那种火花、闪光，用一种朴素的、优美的、准确的、形象、精练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个严肃的作者，是不会放弃艺术的。

这里，我想谈一谈借鉴意识流的方法的问题。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意识流不能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同日而语。第一，

意识流只是一种手法。这种手法想改变某些过去过的传统的形式，通过人物的迅速变化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来体现作品的主题。封建社会不可能有现代的大工业，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因此，封建统治时期，包括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活还在随着人们慢条斯理地、比较缓慢地行动。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出现了现代化、自动化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使得社会生活的速度、节奏、习惯有很大改变。为了和这种新的社会生活速度、节奏、习惯相适应，有的作家就努力追求通过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的思想、情绪、心理状态的复杂变化，来表达自己的创作主题。意识流作为一种手法，大约最早出现在英国，在二十年代曾盛极一时，到四十年代开始走向衰落。我认为意识流只是一种手法，一种艺术表现手段，不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第二，现在的作家，假如采取意识流手法，做为自己创作方法的一个部分、一种作法、一种技巧，来充实自己创作的表达能力，我不得不反对，反而赞成。所以对王蒙同志最近发表的《蝴蝶》，我很欣赏，包括他的《布礼》，我也可以接受，他的《风雪飘零》也是不错的，同时我希望他用更坚实的手法，写出一些更加深刻、更加优秀的东西。

现在对文艺创作的社会问题引起了讨论。社会问题同提出来以后，确实出现了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极端，就是有些同志，把社会效果问题简单化，把它接过去加以歪曲，象做打人的棍子和帽子；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作家一提到有人提社会效果就头疼，就反感，有的同志甚至提出来，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效果？有些作品的社会效果现在还看不出来，还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清楚。任何作品的社会效果，都要有一定时间的检验，才能断定它的高低优劣、成败得失，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一点我是不同意的，这就是有的同志几乎完全否定作家在创作中，可能而且应当考虑到作品对社会的现实和社会影响。我没有读过创作，只写过一些不同体裁的文章，但我自信对于创作问题还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作家在构思时完全不考虑作品的效果，完全不考虑作品的主题思想可能产生的作用，完全不把自己的世界、政治、道德、审美自觉地表达出来。这种作家，我认为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可能有这种作家，他们进行创作没有明确的目的，他写作为为了自己。但这种现象不可能在广大社会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他甚至可能象流星似的，突然闪亮一下，尽管有人叫好，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亮了。要成为优秀作家的，应当是严肃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对人民是满怀信心和热情的，具备这种条件，才能成为大作家。

对我们青年作家今后创作的发展，我还想提出一点期望。希望我们的作家、诗人，假如你有志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就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远大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力求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力争成为一个大诗人，不满足于做小诗人时时髦。

有的同志问：“新诗要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这条原则应当怎样看？我个人认为，从新诗发展的几十年的历史实践来看，对于我们现在的诗人的创作实践来说，这个口号为一说是可以的，但要把它绝对化，就不恰当了。离开“五四”以后新诗的实践，撇开这条道路，仅仅采纳古典诗歌的经验和民歌的经验，要很好地发展新诗，是不大可能的。不要排斥任何对我们有益的、有营养的东西，对古今中外的东西都不要排斥。有些年轻的同志对我们的民族传统，表现出某种怀疑甚至轻蔑的态度，对民族文学传统不以为然，不大赞成取我们的民族传统的精华，这恐怕只能被看成是这些青年同志文艺见解的一个弱点。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诗人，你就应该懂得我们的民族传统，你必须认真地继承我们的优良的传统文化。不“入乎其中”就不能深刻理解它；还要“出乎其外”，不被它束缚、所淹没，然后把它化作为自己的东西，搞自己的真正的创造性劳动。这样才能真正开拓创新的健康道路，才能真正合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前进离不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向，离不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这个总目标。

（本文是作者1980年9月间在《诗刊》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原载《文艺研究》1980年第六期，本报摘发转载）

《文艺界》今年改为半月刊

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已全文发表

《文艺界》今年改为半月刊后，已经出版三期。第一期上全文发表了胡耀邦同志1980年2月间在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联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共分八个部分，即：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和希望；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言论、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关于干预生活和写实美；我们的文学题材无比广阔；要培养和锻炼一支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文艺创作大军；最后讲几句希望的话。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反映我们国家、人民的精神风貌，同时作为精神的风火，引导九亿多人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理想，更高的革命品质、风格，推动我们的历史前进，这就是我们文艺创作要注意的问题。”胡耀邦同志还指出：“我们的作家应该把高尚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赞美它，歌颂它，使更多的人在他们的榜样面前感奋起来，仿效它，学习它。这就是斯大林讲的，作家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努力塑造

最低的最高尚的灵感。也要把那些丑恶的、低级的东西发掘出来，剖析它，暴露它，反对它，使人们警惕起来，同这些东西划清界线，以至最终把它消灭。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进步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要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和改造社会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经常强调的文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积极的社会效果。”胡耀邦同志在最后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时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为我国伟大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让我们手拉着手，心连心，前进吧！”

《文艺界》编者在这组话中指出：“讲话就是当前文艺工作、文艺创作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我们相信，一切关心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的人们，都会从这个讲话得到启发。”

最近出版第三期《文艺界》，开始刊登文艺界同志研读这个讲话之后所写的文章。克勒在《艰难的起步》一文中说，现在发表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是非常适时，非常有意

义的”，“不但对当前某种程度思想混乱的状况起到稳定和澄清的作用，而且对胡耀邦同志尊重文坛的民主作风、耐心诱导和坚持原则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赵超的《文艺家是在前进的鼓舞者》一文认为，讲话的主题是“在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深刻地反映我们新时代这个重大课题上”，而正确地认识新时代，深刻地反映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就需要对生活有起码的、基本的态度，这就是讲话中指出的：“决不应该放弃对生活的冷淡的旁观者，决不应该放弃自己推进事物发展的责任。”这两篇文章都就当前文艺工作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已出版的三期《文艺界》还发表了李准汉的《关于写革命作品的几个问题》和李唐、董文英、王元化、李健吾、胡采等人的文章以及关于影片《天山传奇》、《巴山夜雨》等优秀作品的评论。为辅导青年写作，还开辟了“走向文学之路”、“文学青年之页”等新的栏目。

赵超

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在《朔方》发表以后，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普遍注意。这篇作品写得很好，很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深情。

作品主人公许灵均的爱国深情，里面熔铸了他二十余年人生道路上的悲歌。

他有过一段记忆前的裹在金银首饰中的生活。但童年并不幸福。父亲是父亲和母亲感情不合，父亲出国远走，母亲病故，他成了一个被孤儿遗弃的孤儿。解放后，他在学校里受到党的培养和教育，做着未来的美梦。但是，当教师不收入，不幸很快又降临到他头上——他被划为右派，流放到农场劳改。由于农场艰苦的偶然机会，他和一个叫秀珍的四川姑娘结了婚，生了女儿。1978年，他作为错划右派得到改正，重新安排执掌。接着他的父亲从国外回来，要他带着全家出国定居。他没有去，又回到了他受那里苦，然而却深深地爱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他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而在他们正盼望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精雕细刻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的根！”

“生命的根”，讲得何等好啊！根是深深扎在泥土中的，从那里吸取养料和水，以维持生命的欣欣向荣，促进春华秋实的代谢。把根从泥土中拔起，同时也就是生命行程的中止。所以说“故土难离”。许灵均把他生活的地方叫作根，这个扎根的过程，要他一生人为之艰难得多，曲折得多。也许正因为如此，也就更深一些，更稳固一些。他无幸得到优渥的生存条件，只能象生土在峭壁上的松柏那样，把根须从巨石的缝隙中伸进去，抓住每一点适于生存的土地，找到养分，获得生命的源泉。我想，俯仰之间的望人松、黄山迎客松之所以美，那舒展遒劲的枝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恐怕也与生长的不易和根深难摧分不开。对于坚韧性强的内在的美，就在于以质朴无华的形式，蕴蓄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就在于他的艰难磨难之中，能够把生命的根扎在人民之中，表现出那样深沉的爱，那样完全出自内心的柔情。

许灵均对他故乡于其上的土地和自然的爱，对与他一同放牧的牧人和牛马的爱，对他的患难与共的妻子秀珍的爱，都无不深深地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爱。

作品对秀珍以及许灵均与秀珍的关系的描写，主

要在第四节，是通篇写得最精彩的部分。秀芝这个丫头从四川逃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女青年姑娘一样，拎着小白包袱，把自己的青春当作赌注，押在男人的赌场上，吉凶祸福，都只能听命运的安排。她的许多坎坷几乎是流派的命运结构了，开始了新的生活，对她来说，找到了一个能够依托终生的人；对她灵均来说，有了一个真正的妻子、奇特的命运把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赐给了她。作者对秀芝的描写、朴实、乐观、善持家的美质的描写，都是很成功的。例如初次见面的场面上秀芝上床叠被，接着拉出一条旧裤子来补自己的细节；看了影片《列宁在1918》之后嚷上茶笑嘻嘻地挂着一面包会的，牛奶会的；茶喝得；丈夫的右眼因改正以后，她数着从来没有见过的五百块崭新钞票，怎么数数不清的细节等，都产生了一种浮薄的效果。在秀芝这个带有民族特色的劳动妇女形象的塑造上，倾注了作者深厚的感情，包含了她对生活的独到的思考和见地。

写好秀芝这个人，在《灵与肉》中是有决定意义的。她不仅使许灵均对故国故土的热爱落到实处，而且对他拒绝出国定居提供了可信的内在依据。所以，作者说：“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他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的根须更深深地扎进这块土地里，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他和她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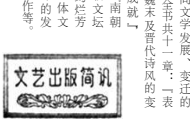
许灵均经历了那么多人世冷暖以后，在有可能离开国家，去追求安逸的物质生活的时候，没有象《人到中年》里的姜亚芬夫妇那样远走高飞，祖国是多难的，但多难的祖国是可爱的；他需要许灵均这样的女儿留下来。爱国的感情在作品中是炽烈的，然而表现是含蓄的，浑厚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教，却发人深思，移人情性。作品中的一节，是写他对对照的写法，他对人民、对生活的他已经成了本能的的爱，与对父亲的隔膜和与之相处的压抑加以对照，更加强了作品的效果。

读着《灵与肉》，让人想到两三年前那组的那些燃烧着对故土和人民的热爱诗篇。在那个盛行着专制制度，士人们习惯于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不见容于怀王父子，多次被放逐，他也不愿离开楚国，而且高唱“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诗句。作者用屈原的字，作为他的主人公的名，用意是深长的。

赞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

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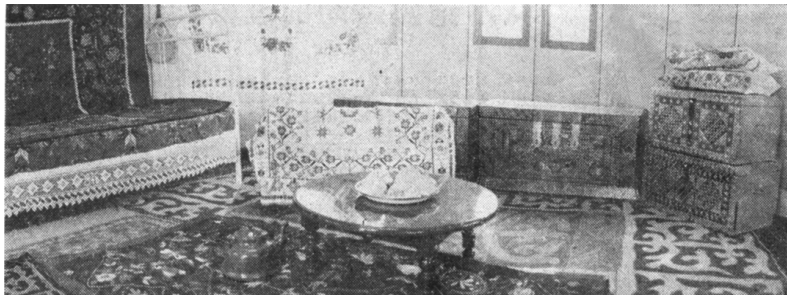
劳动者的爱国深情



绚丽多彩的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用品

刘金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聚居着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等十三个民族。勤劳智慧的新疆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双手美化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许多生活用品既实用，又精美，是我国工艺美术园地中的一朵绚丽之花。和田、莎车生产的艾得莱斯绸在纺织和染色上都别具一格，它的花纹自然流畅，缝制出的衣裤雅致、美观、大方，深受少数民族妇女的喜爱。新疆花帽是少数民族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花帽以名贵的巴达姆果实做帽顶花纹，以水纹做帽边图案，显示了新疆的风物特色。古雅的民族乐器不仅是各族人民开展文艺活动的用品，也是精巧的手工艺品。乐器造型独特、音质优美，对于能歌善舞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乐器是他们的小伙伴。新疆地毯质地细腻，坚实耐用，纹样色泽绚丽协调，富有丝光感，被誉为“东方式”地毯。此外，新疆生产的小刀、陶器、铜器、绣织品和皮靴鞋等也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些产品正象朵朵艳丽的鲜花与其他民族用品之花竞相开放，把我国各族人民多彩的生活点缀得更加美丽。



哈萨克毡房。

花纹不同的地毯。 樊桥健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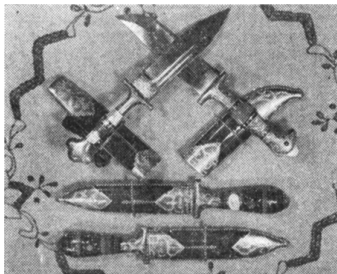
身着民族服饰的塔吉克族少女。

樊桥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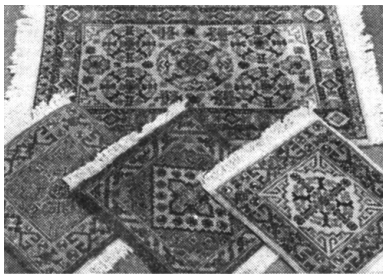
洗手用的铜盆和铜壶。

各种乐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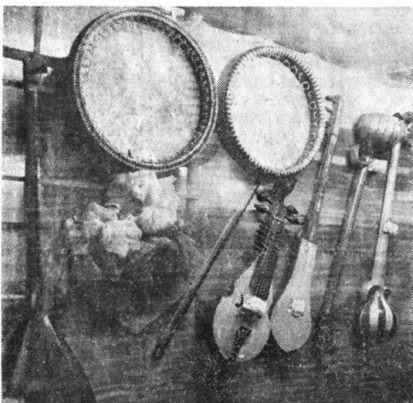


制作精细的小刀。

樊桥健摄



美丽的柯尔克孜族绣织品。



老顾问在乌鲁木齐市乐器厂。

深受群众欢迎的陶器。

选购心爱的花帽。 高兰清摄
维吾尔族老乡赶集用的呼尔群（装杂物的马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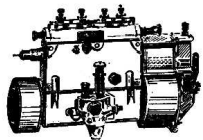
樊桥健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为包迪、卢传友摄)



吉林省伊通高压油泵厂向您提供 喷油泵总成



W 50 型 用于小依发载重汽车
H 6 型 用于大依发载重汽车
T111R型 用于太托拉载重汽车
6120 型 用于黄河、龙江、江淮载重汽车
706 R 型 用于斯柯达载重汽车

保证质量 实行“三包” 供应配件 承担维修
供货及时 代办托运 服务周到 欢迎订购

我厂是一机部喷油泵定点生产厂，产品性能良好，符合发动机要求，质量稳定，使用可靠，价格合理，欢迎选购。

地址：吉林省伊通 电话：2447 2648 电报挂号：1111

产品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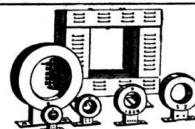
本厂恪守产品合同，保证质量，实行三包，交贷迅速，欢迎用户来人或来函订购。

TFKL 系列可控硅励磁装置

本产品适用于 75-500 KW 同步电机励磁。代替普通励磁机作为自动调节的励磁电源，能够根据电机电压大小变化对励磁电流进行调节，以保证发电机稳定运行。



压制定，本产品性能稳定，运行可靠，已推广使用。



BLZ 系列直流电流互感器

本产品是直流电流互感器，具有线性度好，测量精度高，输出信号大，且耐潮湿、电气隔离，安全可靠等特点。其用途 BLZ-1 (5/0.1-25/0.15 A) 适用于直流电力系统作为电流反馈及自动控制用；BLZ-2 (15/0.1-20/0.15 A) 适用于直流系统，可以使交流继电器作为过流保护；BLZ-3 (40/0.5-100/5 A) 适用于电机电化及其它企业用于直流计量；BLZ-4 (20/0.1-25/0.15 A) 适用于直流计量。本产品为一器两用，一定在工厂生产的产品，有多数生产单位，质量优良。本厂又试制成功 BLZ-2、3、4 型直流电流互感器，还生产 LQG-0.5、LMZ1-0.5、LMZ2-0.5、LQJ-10 型电流互感器。欢迎选用。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五七路 43 号 电话：4076 电报：4848

MCK 型自控机

本产品系采用半导体器件的程序控制装置，适用于各种规格的燃气发生炉自动控制生产水煤气或半水煤气，其性能稳定，使用简单，维修方便，运行稳定可靠。



保定市电器控制设备厂

中国建筑石雕公司

向国内外提供建筑艺术石雕及各种石质的装饰材料

经理部地址：北京西郊百万庄建材部供应分属局内
电话：6932821

各大区 经销处地址

华东经销处：上海威海卫路 647 弄 15 号
电话：53334 电报挂号：3810
华北经销处：天津和平区南海路 11 号
电话：331482 电报挂号：2800

中南经销处：湖北省武昌何家坡
电话：73592 电报挂号：5595
西南经销处：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北路
电话：92788 电报挂号：0001
西北经销处：陕西省西安市小南门边家村
电话：24158 电报挂号：4545
东北经销处：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
电话：33028 电报挂号：2824



经营 项目

承包国内外建筑石雕工程，楼台亭阁、桥梁涵洞、古迹修复、各种碑碣、纪念碑、人物雕像、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艺术制品及建筑粗料石材。

经营泰山花岗石，具有优良性能，抗压强度达 1200-2400 公斤/平方厘米，耐酸率达 98%，工业上广泛应用。粗石料：应用于马路沿石、水沟盖石、货物基石、地面铺石等。细石料：应用于地窖馆所的墙、地面装饰、梁柱、窗台、平台、栏杆、门坎、石桌、石凳、纪念碑、塔等。工业上还可修筑原油罐、地埋式貯酒池、煤气柜、酸反应塔、电解池、酸池、碱池、硝化锅、氯碱罐、酒发酵池、耐腐蚀地面、耐腐蚀机座、高标准井并井壁等等。

公司地址：山东省泰安县城泰成库路（原县建材院内）
电话：2324 2325 4337
电报挂号：4539



石质优良 色泽鲜艳 工艺精美 信守合同 代办托运 欢迎惠顾